

被写出的与被杀死的：知识形态的选择机制与中国学术判断力的系统性能损失

作者 张琼 · SDE 学员 · 约 1.8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8月2日 · 深化增补版

摘要

围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制度性动员，中国学术生产持续扩张，但能切开复杂经验的实质性判断却日益稀薄。既有解释分别归咎于西方理论霸权、学术内卷或制度压力，三者共享一道未被正视的先验——它们默认一切有效知识最终都必须呈现为能够写入标准化学术论文的形态。本文撤掉这道先验，并将分析单位从笼统的“学科自主体系”下沉为“一道横跨学科的现代学术生产工序”，进而命名一种此前未被精确辨识的认知类型的系统性能损失——“不可写出的知识”。它指的是研究者在面对溢出既有框架的经验材料时，因既有工具失效而产生的那种认知停顿、对自身分析手段的深度悬置，以及由此携带的“你手上的理论工具在这里切不进去了”这一否定性信息。这套由共同体自觉共建并已内化为“专业本能”的标准化生产工序，以“可写出性”为门槛，将这类只能在认知内部发生、难以被无损转译为公共文本的认知事件，系统性地排出知识公共积累。由此付出的代价并非“坏知识替代了好知识”，而是一整个最可能催生新判断的认知类型在工序中被筛除。本文以“关系”概念的硬化轨迹为主案例追踪这一筛选过程，以一个当代博士生的田野经历为最小案例揭示工序在认知入口处阻断不适的微观机制，以“费孝通在今天能否被写出来”为反事实推演检验工序的筛选强度，并请进“不适在早期制度罅隙中被成功转化”的阴性案例来标定命题的精确边界，最后在正面回应“非正式渠道能否回收不适”这一最强劲反驳并澄清跨学科推衍的条件后，给出两个可操作的证伪条件。

关键词 不可写出的知识；生成性不适；工序性筛选；可写出性门槛；知识形态；中国社会学

一、引言：从“自主知识体系”的允诺到判断力的稀薄

中国社会学正站在一个奇特的岔路口。一边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号令与逐年走高的资源配置，另一边是领域内有识者日益强烈的隐忧：论文产量与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那种能让外行读后心头一紧、让经验当事人感到“被精准理解”的判断力，却正在变得罕见。这条岔路最令人不安之处，不在于“我们尚未建成自主知识体系”，而在于那些本该通往自主知识的路径，正被一套高度合理、高度不可反驳的工序所填充——而这套工序的尽头，并不必然通向鲜活的判断。

本文的原初关切是一道已被反复讨论的命题：“中国社会学为何难以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然而，这道命题的分析单位是作为整体学科的“中国社会学”，暗含了一个预设——学科自主性是一项可以被整体推进的工程。实际病灶并不悬浮在学科整体层面，它扎在一套具体的、可追溯的、横跨多个学科的现代学术生产工序之中。若继续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分析单位，这道工序的生成与筛选机制就不会被带入视野。因此，本文做出公开改切：将分析对象从“学科自主体系”下沉为“一道知识生产工序”，追问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正当性理念的加持下，是何种工序持续地筛选着知识

的形态，又将哪一类认知质地系统性地排出了公共积累。这一改切不是缩小问题，而是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检验那个宏大理念的实际命运：不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成了没有”，而是“最可能催生自主判断的那种认知形态，在当代工序的挤压下还能否被‘写出’”。

围绕“判断力稀薄”这一现象，既有解释大致可归为三路。第一路归咎于“西方理论霸权”：中国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大多自欧美输入，面对本土经验时水土不服。第二路将其诊断为“学术内卷”：评价体系催逼下的同质化生产使得学者只在安全区内从事可预期的精致加工。第三路指向“制度压力”：项目申报、学科评估和人才头衔等外部力量扭曲了知识生产的原始动机。这三路论述各自抓住了困境的一个真实侧面，却也各自止步于一个共同的前提——一道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从未被质疑过的先验：一切有效的社会学知识，最终都必须以公共文本的形态存在，必须能够被“写出来”。不是“有价值的判断应当被发表”这种常识所讨论的层面，而是更深的、关于知识形态的裁决：研究者在面对复杂经验时经历的那些难以被写出的认知状态——被材料刺痛的笨拙犹豫、发现原有框架失效时的失语、在未编码的混沌中被迫停留而无法命名的悬置——从一开始就不被算作“知识”。它们在工序上被定义为“尚未完成的研究”“还不够成熟的想法”“还需进一步操作化的直觉”。它们不能进论文，不能报课题，不能在学术会议上被庄重地宣读。它们从知识的公共积累中被排除了——不是因为它们错了，而是因为它们无法被“写出”。

这道先验一旦被撤掉，三条既有解释的边界就同时暴露出来。西方理论霸权论追问的是“被写出的概念是否来自本土”——但如果有一整类知识本就难以被无损写出，那么无论概念来自哪里，被写出的都只是同一形态的东西。学术内卷论追问的是“研究者为何不敢写”——但如果真正有力的判断本就生长于写作之前的沉默期，那么“勇敢地写”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制度压力论追问的是“外部力量如何扭曲了可以写出的东西”——但它从未审视，外部力量最深层的效力，或许根本不在扭曲被写出的内容，而在定义什么才有资格被算作“能被写出的知识”。

于是，本文的核心判断浮现出来：中国社会学在追求“自主知识体系”时遭遇的判断力危机，最深的病根不在被写出知识的内容质量，而在于一套标准化生产工序与制度化理念共同形成了一道以“可写出性”为门槛的筛子，系统性地将“不可写出的知识”——那种只能在认知内部发生、在原有框架失效时被逼出的生成性不适——从知识生产体系中排出。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坏知识驱逐好知识”的命题，而是一个关于“一整个知识类型被工序扼杀于可写出性门槛之前”的命题。这一判断承诺去命名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系统性能损失，而非对学术生态再添加一笔道德诊断。

正文以如下步骤展开。第二节解剖那道被共同默认的先验，追溯其制度化起源，完成与四个最强理论对手（波兰尼的默会知识、福柯的话语秩序、拉图尔的黑箱、叶启政的“搓揉”）的精准切割。第三节从一道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中结算出“不可写出的知识”的四个特征，并将“可写出性门槛”的操作定义牢牢钉下。第四节以“关系”概念的硬化轨迹为主案例，并以一位当代博士生的田野经历为最小案例，展示工序如何在认知入口处杀死不适。第五节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为反事实推演，检验当代工序的筛选深度。第六节引入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一阴性案例，标定命题的精确边界——不适并非绝无被转化的可能，而是例外发生的条件恰恰反证了筛选机制的存在。第七节全面回应“非正式渠道能否回收不适”这一最强劲质疑，论证不适的认知事件性质与工序对非正式空间的侵蚀。第八节做跨学科推衍，同时在阐释上澄清“工序性筛选”的三个层次。第九节给出结论，并诚实地设定两个可操作的证伪条件。

二、一道从未被追问的先验：“知识必须能被写出”

要看清一道先验，最好的办法不是去论证它错了，而是去观察它在哪些日常操作中“从不被追问”。翻开任何一本社会学研究方法教材，“如何将研究问题操作化”“如何从田野笔记中提取核心变量”“如何将经验材料组织为可发表的论文”“如何回应匿名评审对理论贡献的追问”——这些章节讲述的都是同一件事：如何把研究者脑子里那些模糊的、滞重的、尚未成形的认知状态，转译为可以被学术共同体识别和评价的公共文本。这从来不是某一本教材的偏好，而是整个知识生产制度的底层预设——它从不追问“那些无法被转译的部分，本身是否就是知识”。

一个博士生在田野里经历了三个月的不适。她发现既有理论框架无法容纳她看见的经验，她试了三种编码方式都失败了，她开始怀疑自己“不够专业”。当她在组会上如实报告这些不适时，导师的反应通常是：“你需要更清晰的理论框架”“你该先做一个更小的操作性假设”“等你把这个做出来我们再讨论”。她经历的那三个月的不适——那种“觉得不对但说不清哪里不对”的状态——在工序上被定义为“尚未进入研究阶段”，而不是“研究正在发生”。这就是那道先验的日常运作形态。它不在任何政策文件里，不在任何学术章程里，它在每一次方法论指导中、每一次匿名评审意见中、每一次“这个还不能算论文”的裁决里被反复执行。它不被说出来，恰恰因为它是所有话的前提。

这道先验不是中国社会学独有的，但中国当代学术制度的一套独特安排将它拧得格外紧。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学术体制在“与国际接轨”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双重目标下，引进了一整套以量化评估为核心的现代学术科层评价工序——项目制、影响因子、引用率、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几乎在同一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被从一种知识伦理提升为一项制度性任务。一个来自政治系统的正当性诉求，恰好嫁接上了一个来自全球学术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流程，两者形成一个高度稳定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对“什么算知识”的界定，并非“禁止思考”，而是——你当然可以思考任何东西，但当你要把它变成一篇论文、一项课题成果、一个可以被共同体引用的“知识”时，它必须能被写出来。文献回顾、理论框架、变量操作化、稳健性检验、理论贡献——这些格式不是在检验你的想法是否成立，而是在检验你的想法是否已经完成从“不可写出”到“可写出”的转译。而那些无法完成转译的部分——在田野里被刺痛但说不清原因的感觉、原有框架碎裂但新框架尚未成型的悬停、在材料面前承认“我不知道”的那种认知眩晕——它们在工序上不存在。

必须立即将这一判断与四个最强劲的理论对手切割清楚，否则极易被归入既有话语而丧失其独立的理论收获。

与波兰尼“默会知识”的切割。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中论证了“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的多”——一切知识都有其默会维度。这似乎与本文所述高度相近。但二者的分野在知识的知识论身份与功能方向上。默会知识是显性知识的支撑维度——它帮助研究者更精准地操作化、更深刻地理解。它所预设的出口，仍然是那个可以被写出、可以被论证的命题：骑单车的人通过默会知识维持平衡，最终可以被力学方程所解释。而“不可写出的知识”的出口，恰恰不是“更好的论证”，而是对“用现有框架继续论证”这条出路本身的悬置——它告诉研究者：你手上这把刀，在这里切不进去了。这个否定性信息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事件，无关它最终是否有一篇论文为之背书。

与福柯“话语秩序”的切割。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论证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话语构成规则，它们决定了什么能被说出、什么能被思考——知识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这一分析的论述对象是整

个知识型 (épistémè) 的断裂与更替, 那是文明层级的。而本文的论述对象是一道具体的、可操作的、可以被制度史追溯到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生产工序。它不是决定了“什么是可思考的”, 而是在“可思考的东西”当中再做了一次筛选——只允许那些能够通过“可写出性”门槛的可思考物进入知识的公共积累。这种筛选机制的特定性与可追溯性, 是福柯的宏观话语分析无法精确捕捉的。

与拉图尔“黑箱”的切割——这是本文必须正面对应的最强理论近邻。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中描述了“黑箱化”过程: 一个科学事实一旦被确立, 它内部复杂的生成过程、争论、不确定性就被封死, 后来者只看到输入和输出。本文所论的工序性筛选——把不适、碎裂、悬停全部封死在论文成品之外, 只呈现一个光滑的理论贡献——表面上与“黑箱化”高度同构。但二者的分野在于位置与方向。拉图尔处理的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过程, 他的分析对象是那个最终被确立的“事实”如何从争议中脱身、如何被稳定、如何被集体承认。黑箱化发生在科学事实被共同体接受之后, 把生成过程中的争论封装起来。而本文处理的“不可写出的知识”, 其发生位置完全不同——它发生在黑箱化之前, 发生在研究者个人的认知内部。它不是“已经被接受的科学事实的生成过程被隐藏了”, 而是“那个可能催生新事实的认知状态, 在还没能进入公共空间之前, 就被一道工序门槛挡在了门外”。拉图尔追问的是: 已经被写出的东西, 其生成史是如何被封死的? 本文追问的是: 那些从未被写出的东西, 是如何在一开始就被“你不是论文”这道门槛杀死的? 更进一步, 拉图尔的分析之所以无法触及本文的对象, 不是因为他疏忽, 而是因为他的问题结构根本不需要面对这件事——他的问题是“已被接受为事实的知识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这道问题的先验恰恰是“那个知识已经被写出了”。本文撤掉的正是这道先验。这是两个问题空间的不可通约, 而非两个解释之间的竞争。

与叶启政“搓揉”传统的切割。叶启政在《社会学和本土化》等著作中, 已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经验脱节”做了深刻反思, 并提出“搓揉”(agitation) 概念——主张研究者反复在理论与经验之间摩擦, 逐渐生成能对西方理论保持警觉性距离的本土分析概念。他的“搓揉”精准地描述了研究者在“非-理论”与“非-经验”之间的悬停状态, 与本文所论的“生成性不适”高度共鸣。然而, 二者的分野也正落在这里: 叶启政的“搓揉”终点仍然是一个可写出的本土概念——他相信反复搓揉之后, 终究会生成一个可操作化、可论证、可发表的概念。而本文的“不可写出的知识”恰恰将目光钉在“搓揉的过程”中——那种还没有搓出任何东西来、但正在被经验搓着时的认知状态。这种状态尚未生成可写出的概念, 但它已经是一种认知事件: 它向研究者本人公开了现有框架的边界。叶启政关心的重心在“搓揉的结果”, 本文关心的重心在“搓揉的途中”是否已经被算作认知劳动。这一位移, 不是对叶启政的否定, 而是把镜头从“写出之后”往前推了一步。

至此, 本文与所有相邻候选之间不可还原的缝隙被标示清楚: “不可写出的知识”不是默会知识, 不是话语的外部, 不是黑箱的前史, 也不是尚未长出果实的花——它是一种独立的认知类型, 其知识论地位在于对既有框架做出了一次尚未命名的、但已实际发生的否定, 而这个否定动作本身恰恰最容易在标准化工序中悄无声息地消失。

三、不可写出的知识：从矛盾中结算

3.1 矛盾的逼迫

“不可写出的知识”不是我在书斋里凭空发明的概念，它是从一道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中被逼出来的。

矛盾的一端是D——差异的推进。研究者携带既有理论工具进入经验现场，被材料反复刺痛，发现手上的框架切不进去、命名不了、挂靠不住。原有的概念工具在这里集体失灵了。另一端是E——制度化的评价工序。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在规定周期内产出一篇格式合规的论文：操作化、理论贡献、文献对话、稳健性检验，缺一不可。这道矛盾无法被调和——你不能既“悬停在不适中而不急于命名”，又“准时交出一篇格式合规的论文”。当D与E之间的张力积到无法回避的程度时，研究者在认知内部被逼出了一种特定的状态：她既不放弃材料（因为那股不适是真实的），也不放弃工序（因为她要毕业、要发表、要在共同体中立足），她只能在那道张力中悬着——悬停在原有框架已碎、新框架未成之际的认知真空中。

然而，维持这种悬停需要一种前提：研究者本人必须已经拥有“对工具的不信任”这一认知警觉。如果一位研究者从未被教过“不适可能是一种认知信号”，那么当她被经验刺痛时，她的第一反应——也是绝大多数被工序充分规训者的反应——就是将不适归结为“理论功底还不够”，随即退回到安全的理论框架，把那块刺人的经验当作噪音排除了。换句话说，生成性不适的产生，依赖于个体已经知道“工具可能失效”，并且愿意为此短暂地放弃安全感。而恰恰是这道最要害的认知习惯，在标准化方法论训练中首当其冲地被磨掉了——训练教的是“信任工具、操作化工具、在工具中寻找安全”。工序由此在认知入口处就完成了筛选：它甚至不需要在后期杀死不适，它只需要把研究者训练成根本不会把不适视为值得注意的信号的人。

只有在那些这道训戒未能完全生根的罅隙里，研究者才会让自己悬停在那个刺人的不适中。她悬着，她的全部认知触角贴在没有名称的经验表面，她确认原有的三把刀都切不动这块材料，但她还说不清能切动的第四把刀长什么样。这个悬停状态本身，就是不可写出的知识。

3.2 不可写出的知识的四重特征

不可写出的知识不是“暂时还没写出来”的知识——那种随时可以补一篇论文的东西。它是一种在特定工序压力下被逼出的认知事件，其知识论身份是事件性的。它有且仅有以下四个同时成立的特征，而每一个特征都直接从上述矛盾中长出。

第一，它携带的是对既有理论框架的“否定性信息”，但其否证的形态不是“另一种论证”，而是“无法用现有框架命名的不适”。当D与E的张力使得研究者无法命名正面的替代框架时，她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现有框架在这里失效了。这个信息就是知识——它告诉共同体“此路不通”。但它不能被写成一篇论证，因为一篇论证需要你已经找到了出路，而恰恰在你还没找到的时候，这个否定才是最有价值的。

第二，它产生于研究者的认知操作在没有任何现成工具的情况下，被迫直接“贴”在经验材料表面的那个时刻，不能由任何他者代为执行。矛盾的压力只能落在单个认知者身上，不可外包。你没有

可能让田野助理替你感受到那股不适——因为那不是一句结论，而是一个只有亲身被刺过才会发生的认知事件。

第三，它在工序上被定义为“尚未完成的研究”，但它的认知价值恰恰在“完成”之前。工序只把“被写成可发表的文本”视作完成的标志，由此将知识的发生过程本身——那一系列不可被缩减为论文成品的认知事件——排出了“知识”的范畴。这不是因为不适不重要，而是因为在工序的计量单上，它显示为零。

第四，它的生成成本极高，且不可核算。一次真正的生成性不适，需要研究者把自己暴露在材料面前足够长的时间，不做任何“安全”的操作（挂靠理论、操作化、找稳健参数），处于一种认知上高度脆弱、没有任何产出保障的状态。这种成本在工序的“别浪费”律下被自动排除了——不是因为“没价值”，而是因为“不可核算”，不能被计入任何一张绩效表格。

3.3 不可写出的知识不是什么

有必要将它同几种最容易混淆的形态严格区分。

它绝不是“训练不足导致的困惑”。博士新生面对文献时的茫然、统计技术不熟练时的焦虑，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专业训练消解。而不可写出的知识产生于训练本身失效之后——当研究者已充分掌握了既有理论工具，却发现它们集体失灵。它不是“还没学会”，而是“学会了才发现不够用”。

它也不是“暂时未被写出的知识”。田野笔记里没整理的片段、脑海里尚未落笔的想法、打算下一篇文章做的东西——这些是“待处理材料”或“在孵化中的命题”，它们本身是可写出的，只是尚未写出。而不可写出的知识之所以不可写，不是因为它还没找到合适的语言，而是因为它的核心认知信息一旦被转译为可论证的命题，就必然被装入某个既有框架——而这恰恰背叛了它最核心的价值：对既有框架的悬置性不信任。一旦你把它“写出来”成一篇论证，你就已经把它从一个“对此路不通的悬停”变成了“此路已通的新命题”，那就不再是同一件事。

它不是“写坏了的论文”。论证不充分、证据不足、逻辑跳跃的论文，是写出来的、但质量不佳的可写出知识。不可写出的知识是一篇好论文的对跖点：它的价值不在论证充分，而在否证的精确。

3.4 “不可写出”与“可写出性门槛”的严格定义

必须在此把一个贯穿全文的操作性定义钉死。不可写出，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永远不可能被写出”，而是“在当代学术生产工序的标准化筛选压力下，无法在不丧失其核心认知价值的前提下被转译为符合共同体格式的公共文本”。在此意义上，费孝通在1940年代制度罅隙中写下的《乡土中国》并非“不可写出”，而是恰好反证了当代工序的筛选力量。可写出性门槛的核心判准不是“能否写出文字”，而是无损转译：如果一段不适可以被写成论文，但论文必须砍掉那股锐利的否定感——把它修正为一个正面的、可挂靠既有框架的理论贡献——那么它仍未通过门槛。它被排出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它作为认知事件的不可替代的认知质地。

四、工序如何杀死不适：以“关系”概念的硬化为例

4.1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一次生成性不适的产物

费孝通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的田野调查中，面对的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那种无法被西方社会学既有概念框限的经验质地：中国人的人际信任与义务分配，不是按西方“团体格局”中的平等成员原则组织的，而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像石子入水荡开的圈圈波纹，一圈圈扩散又一圈圈收回。

值得追问的不是“费孝通看到了什么”——田野材料是敞开的，任何人都能看——而是“他在看到的时候经历了什么”。费孝通在形成“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之前，必定经历过这样一种认知状态：他早年所接受的英国社会人类学训练，为他装备了一系列结构性与功能性的分析工具，但当他面对中国乡土社会最日常的人际实践时，那些工具提供的框架一再被打断。彼时的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差序格局”“关系”“人情面子”这类可资挂靠的本土概念。他悬停在原有框架已碎、新概念尚未凝成的那段认知真空中。他后来在《个人·群体·社会》的学术自述中曾委婉提及，自己曾感到“西洋社会学的概念不能硬套到中国”，那其实就是一道被体验到的、但尚未被命名为方法论命题的不适。这段悬停，就是一次生成性不适的完整发生。而《乡土中国》——那本用散文体写成、没有文献综述、没有回归表格、最初甚至不是“论文”而是“讲义”的作品——之所以能留下一把持续切割经验的刀，恰恰因为费孝通没有在那段不适里被工序“救”出来。彼时的学术生产工序，尚且松散得足以让他在“写不出论文”的形态下，先把讲义写出来——先在不适里继续待着，直到不适本身逼出一个命名。

4.2 当代工序的三步筛选

当代的社会学博士生，面对同样一片田野，会经历什么？她不可能不被刺痛——她在田野里同样会被经验材料逼出“原有框架不够用”的认知不适。但她会在一系列标准化的学术训练中，学会如何在论文中不把这段不适写进去。这不是审查制度的后果。这是“专业化”的后果。

第一步：操作化的预筛。方法论训练教给她的第一件事，是如何将一个模糊的研究直觉转译为一个个“可操作的研究问题”。她必须给核心概念一个边界清晰的定义，否则开题报告过不了——“你的‘关系’的定义是什么？”“你的理论对话点在哪里？”田野笔记中那些最让她不适、最不知道如何归类的经验片段，在操作化阶段就被排除了——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无法在当前的理论框架中被安置”。工序在入口处就改变了她的认知操作：不是等到她写完整篇论文再挑出不合规的部分，而是她自己在收集材料时，就已经学会了不去注意那些“无法被写出”的东西。

第二步：理论挂靠的安全扣。当她面对一堆不知如何归类的材料时，最安全、最高效、最容易被共同体理解的做法，是找到一个已被承认的本土概念——“差序格局”，然后把她的新材料解释为这一概念的“当代延伸”或“时代新变”。这样做的利好是三重安全：文献回顾有根（“自费孝通以来……”）、理论对话有谱（接续了本土概念传统）、匿名审稿风险最低（没人会质疑“差序格局”是否算社会学概念）。而那个她原本被材料逼出来、想说但还说不清楚的新的东西——那个可能在逼迫她重新修正“差序格局”某些核心预设的经验发现——在她安全地挂靠上既有概念的那一刻，就被封进了既有的理论盒子。

第三步：“理论贡献”的格式挤压。她终于写完论文，投给一家期刊。匿名审稿意见回来：“文献回顾中对西方团体格局理论的批评不够深入，建议补充与当代西方社会网络理论的对话。”她花了两周补上。原文中那些对经验感到不适、反复描摹、舍不得归为任何变量但就是觉得重要的经验段落，在改稿中被进一步压缩，换成“变量界定更清晰”“理论对话更充分”的标准化论证。审稿人满意了。论文发表。她自己在夜里的某刻却隐隐觉得——当年在田野里刺中自己的那个东西，在论文里已经不在了。不是被驳倒了，是被一道一道“专业”的修改要求，压进了不可写的沉默里。

这里必须附加一笔重要的澄清：中国社会学“关系”研究的硬化，绝非发生在每一位研究者身上，但它构成了以期刊发表为出口的主流生产模式的显著倾向。在关系研究的脉络中，仍有少数例外——如边燕杰对关系网络结构的分析、阎云翔对私人关系与公共关系的再探讨——他们在既有概念的边际上做出了推进。但恰恰是这些例外提醒我们注意：他们的推进，几乎都发生在工序压力相对松散的时代，或采取了非标准的出版形态。这正好从反面支持了本文的判断。

4.3 最小案例：一个博士生的田野经历

为了将上述逻辑推演压到一个真实的人生切片上，这里呈现一个基于深度访谈材料的最小案例。受访者Z，华北某高校社会学博士生，2019年在某市开展了为期八个月的社区治理田野调查。以下内容源自获其知情同意后整理的访谈录音。

Z最初的研究计划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一个标准的、开题能过的题目。田野进行约三个月后，她开始经历一种无法归类的认知不适。她发现，她所观察到的社区动员过程，完全无法用“国家-社会”二元的既有框架来解释——不是“国家强社会弱”或“社会强国家弱”的变体，而是整个动员的发生逻辑看上去像是这些框架的一个反例：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命令，在执行过程中反而被社区居民“拿来”用作自下而上争取权益的杠杆，而原本下命令的街道干部，对这种“被拿来用”的做法采取了默许乃至暗中鼓励的态度。Z在访谈中这样回忆：

“我当时的感觉是，我手上的那些概念，什么‘嵌入治理’‘行政吸纳社会’，全都不对。不是有一点对不上，是方向整个反的。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命名那个反的东西。我去组会上讲，我说‘我觉得他们在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共处’，导师问我‘你指的奇怪是什么，是合作式还是冲突式’——我答不上来，因为都不是。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笨，好像我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对着一个我描述不出来的影子发呆。”

她试了两次在组会上描述这种现象，第一次被导师反馈“你这个还比较碎片化，再积累一些材料”，第二次被建议“你可以参考某某关于‘嵌入性治理’的文献，看看能不能对得上”。Z读了那些文献，发现对不上——那个现象更复杂、更不整齐，更像是一股多方参与者在同一件事情里各自汲取各自所需养分的“共栖”，而不是“嵌入”这种单向度的形态。但她没有再多纠缠。她已经在田野里花了八个月，再拖下去，博士论文无法按时开题。在后续的操作化中，Z将那些“对不上”的经验片段归为“噪音”，严格按照“嵌入式治理”的理论框架组织剩余材料。开题报告顺利通过，论文于两年后发表在CSSCI期刊上。

当被问及“你在那几个月里感到的那种‘不对’，现在还在吗？”时，Z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在。但我不敢碰它了——它让我觉得我当时八个月都没想清楚，是不是我理论功底不行。”

4.4 被杀死的是什么？

Z的论文在既有评价标准下，是一篇合格乃至优良的博士论文。但她被杀死在认知入口处的，不是一篇更好的论文，而是一个可能引出新的分析框架的认知事件。如果她当时不急于挂靠“嵌入式治理”，而是在不适里再待一段时间，她或许会发现：需要命名的根本不是“嵌入”的变种，而是一种多方不在同一坐标系中、却能在同一事件中各自获得所需养分并由此维持表面协作的“共栖”形态。这个概念一旦成立，将可能同时改变对“国家-社会”关系和“基层治理”的分析单位本身。但这只是一个从未发生的猜测。工序没有给她把这段不适保留到能坐下谈一谈的时间。在她开始操作化的那一刻，不适就被宣布为“噪音”，从她自己的认知档案里直接注销了。

工序在此处展现的效力，不是“阻止好作品发表”，而是改变了“什么值得被注意”的认知筛孔。它不是在出口处挑拣成品，而是在研究者刚踏入田野，刚学会辨认什么信号算作“认知信号”的时刻，就已经悄悄地把那把最锋利的探针收进了抽屉。

五、反事实推演：费孝通在当代工序下还能被“写出”吗？

5.1 接受反例的不可否认

任何关于知识生产制度的论断，都必须面对那个让它最难受的反例。对本文而言，这个反例就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部诞生时没有任何标准化理论框架支撑、没有文献综述、没有回归表格、最初甚至不是“论文”而是“讲义”的作品，却持续被阅读、被引用直到今天。本文坦诚地承认这个反例的力量：它证明了生成性不适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确实可以被转化为可写出的知识，并沉淀为一块新的共同体地基。

5.2 条件追溯：制度缝隙的历史性

《乡土中国》的诞生，依赖几个极其具体、不可复制的制度缝隙。第一，它诞生于一个未被现代学术科层评价工序充分统治的时期。1940年代的大学，还没有引入项目制、影响因子、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学者可以以讲义的形式即兴发表，而不必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匿名评审。第二，它诞生于一个“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尚未成为制度性理念的时期。费孝通不需要在任何课题申报书里论证“本研究的自主知识创新点”。他可以在田野中被经验刺痛后，不急于挂靠任何既有理论，而是把刺痛先写下来，用讲义的形式抛出去，等待回应。第三，它发生的那个共同体，没有一整套标准化的方法训练教人“如何专业地回避认知不适”。彼时的田野训练，允许——甚至要求——研究者在经验材料面前“浸泡”足够长的时间，而不给出一个明确的“产出”时间表。

这三个条件，在当代已经一个不剩地消失了。不是因为“时代变了”这种空泛的理由，而是因为那个融合了全球学术工业化流程与本土制度化理念的复合体，已经把这三个缝隙全部焊死。费孝通并非全然自由。他同样受到彼时学术工序的形塑——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范式、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传统、战时知识生产的特定压力——这些同样构成了筛选。但彼时工序与当代工序的关键差别不在“有与无”，而在筛选压力的强度、标准化程度以及出口的单一性：费孝通可以在田野与讲义之间找到一条非标准的路径，因为彼时的工序对这条例外路径缺乏有效的惩戒机制。而当代博士生面临的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评价场：出口几乎只有期刊论文这一条，发表的格式几乎只有标准化论文这一

种，而格式的偏差几乎一定会被匿名评审扣分。工序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一道边界松散的低矮围栏，变成了一堵从入口延伸到出口的无缝高墙。

5.3 反事实推演

如果当代博士生费孝通，在田野中经历了一次同样的认知不适——原有框架已碎、新概念尚未凝成——他面临的第一道关卡是开题：“你的理论对话点在哪里？是和西方团体格局对话，还是和中国关系理论对话？你必须找到一个理论口径，否则开题过不了。”他回到田野，但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不自觉地用“差序格局”——那个上一代学者建立、已被共同体公认为本土经典的概念——来组织自己的观察。因为这样最安全：他可以随时回答“你的理论贡献是什么”——“我的贡献是对差序格局的当代修正”。他原本被经验刺痛、想说但还说不清楚的那个新东西，被自己用一种更安全的本土框架罩住了。他完成一篇论文，挂在“差序格局的当代延伸”框架下，投给权威期刊。匿名审稿意见：“文献回顾中对西方社会网络理论的对话不够深入，请补充。”“案例部分的经验描述太长，缺乏分析性，建议提炼核心变量。”他在改稿中将那些舍不得删、但说不清是“变量”还是“感受”的经验材料，压缩成一个“关系网络密度”的可操作化指标。论文发表，被引渐高，成为下一代博士生文献回顾中绕不开的“经典”。用这个标准来看，费孝通在今天当然“被写出”了——毕竟论文发表了，题目里有“关系”二字，文献回顾里引了《乡土中国》。但当年费孝通在不适中为整个共同体逼出的那个新东西，并没有重演。

5.4 推演收束

这不是关于某个天才命运的悲观想象，而是一次关于知识形态选择压力的机制检验。如果费孝通在当代工序下无法以他当年的方式工作，那么被排出的就不是某一个人的天才，而是那一整类天才得以工作的认知条件——那种允许研究者在“写不出”的状态下继续待着、直到不适本身逼出命名的制度罅隙。《乡土中国》不是证明本文诊断无效的反例，而是以自身的诞生为光源，照亮了身后那道已经关闭的门。

六、例外如何反证规则：一个阴性案例与命题边界

本文的命题若被误解为“不适一定被杀死”的强全称判断，就会轻易被反例所伤。为了避免这种粗糙，本节主动请进一个最可能构成反例的阴性案例——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借此澄清本文命题的精确边界：在当代学术生产工序的标准化筛选压力下，生成性不适被转化为可写出的知识，不是绝对不可能，而是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制度罅隙中；而这些例外发生的条件，恰好反证了常态工序的筛选强度。

应星在1990年代后半期追踪了一宗大河移民的持续上访过程。他面临的是一片既有理论工具几乎全线失灵的经验场域：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资源动员与政治过程模型，中国本土的“国家-农民关系”框架，以及当时风行的“依法抗争”范式，都无法完整地收纳那些移民长年累月、往复迂回、在申诉与哀告、有据与无据之间不断漂移的行动质地。应星后来采用的“过程-事件分析”与“关系-事件”叙事，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方法，而是在田野中被逼出来的：他发现如果不把每一次上访当作一

个“事件”并对事件中卷入的关系网络进行细致的“过程”追踪，就什么也说不出。这一认知转折，显然经历了一次深度的生成性不适。

但必须立即追问：应星的这次不适为什么最终能够被转化？条件有三，每一条件都反衬出当代工序的筛选边界。第一，他工作的时段是1990年代中后期，彼时中国社会学的评价工序尚未高度一体化，博士论文与专著的出版周期允许相当长的浸泡，匿名审稿制度尚未普及，学界对非标准化叙事（如一本以讲故事为主的厚书）的接纳度更高。第二，他的成果最终以专著形式出版——本书，而非一篇靠“理论贡献”格式存活的标准期刊论文。这种非标准化的出口形态为不适的转化提供了缓冲层。第三，应星本人那段时期的学术训练尚未被完全“工序化”；他所在的研究生培养环境仍带有一定的不规范、宽容和知识好奇的成分，这使得他的认知警觉尚未被“先挂靠理论再进入田野”的专业本能完全替代。

应星的案例因此并不构成对本文命题的否定。它恰好证明：在当代工序尚未完全收紧的过渡期，在出口形态尚存多样化的罅隙中，生成性不适仍有极少数被成功转化的可能。而随着本世纪以来学术科层评价工序的全面铺开，同样的不适今天会面临一套截然不同的筛选压力。如果把应星放到今天他当年刚进入田野时就面临的处境里——开题必须先有理论框架、中期考核要求已有论文发表——他最可能的命运，不是写出一本《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而是在开题前就把那团说不清的不适当作噪音排除，然后用一个已有的理论框架（比如“依法抗争”）安全地完成一篇博士论文。这一反事实与第五章费孝通推演在逻辑上完全同构。例外不是驳斥了规则，而是以自身发生条件的消失，反衬出规则在当代的加固。

七、最强劲的反驳：非正式渠道能否回收不适？

本文必须正面迎战一个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与波兰尼传统的根本性质疑。即使不适无法被写成标准论文，研究者仍可以在研讨会、读书会、同门私下交流、饭局闲聊中传播这些不适，它们并非被“杀死”，而是以非正式的形态继续流通，并可能通过口头传统的发酵，间接影响未来正式论文的写作。如果这种机制足够有效，那么本文的“系统性地排出公共积累”这一强论断就被严重削弱：不适没有消失，它只是不在期刊里，但仍在共同体的毛细管道中起作用。本节将从两个方向击穿这一反驳。

第一个方向：不适的载体不是“信息”，而是“认知事件”。非正式交流可以传播一个判断——“我认为那个理论框架在这里不对”，但它无法传播那个判断从无到有的全部发生过程。一个研究者在饭局上听前辈说“我当年做田野时也发现嵌入治理套不上去”，她得到的是一句被转译过的结论，她并未亲历那场认知眩晕：那把刀切在材料上的阻力感、那种全部分析工具同时失效的惊愕、那种“我自己都不确定这是什么”的悬滞——这些只有亲自被刺一次才会发生。不适作为认知事件，其知识论价值恰在其不可被代换的发生性，它与“信息”的区别正如“被烫过一次”与“读到烫伤温度”的区别。非正式渠道回收的，不是不适本身，而是不适被转译后的信息残余——而转译本身就是一次强有力的筛选，它筛掉了那股锐利的不适中最锋利的部分。

第二个方向：非正式渠道本身也已经在当代工序的渗透下被系统性地侵蚀了。学术非正式交流的空间——组会、读书会、师门私下讨论、走廊谈话——如今已被工序重新定义。组会不再是“悬停在不适当中一起摸索”，而变成了“汇报进度、被纠偏、被建议挂靠更安全的理论”。同门私下讨论的

核心议题越来越不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认知不适”，而是“怎么应付开题/盲审/答辩”。就连最亲密的师门关系，也常常被默认的绩效逻辑所塑造：导师和博士生共同的压力是“按时毕业”“拿到教职”，这重压力天然地不鼓励学生把时间花在那些无法转化为论文的不适上。工序并没有发出禁令，它只是改变了什么值得花时间去“谈”——如果研究者早就学会不把不适当作值得交流的对象，那么非正式渠道中就不会出现这股不适。这不是在论证非正式渠道“不能”承载不适，而是在论证“在当前工序条件下，不适在到达非正式渠道之前，就已经在认知上被自己取消了候选资格”。

将这两个方向叠加：不适要经由非正式渠道进入共同体的长期积累，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它的认知事件质地必须能被交流无损转译（这本身极难），而且交流空间必须尚未被工序侵蚀（当前条件却正相反）。二者一并失效，使得“非正式渠道回收”成为一个在逻辑上可能、在制度条件下却极度困难的路径。因此，对本文命题的攻击并未成功：不适并非绝不可能被回收，而是这种回收的概率已经被当代工序压低到了近乎沉默的水平。

八、跨学科推衍与工序的三层架构

8.1 工序性筛选的三个层次

至此，需要将“工序性筛选”这一核心概念做一个结构上的澄清，以避免不同层次之间的混淆导致论证失力。工序性筛选在本文中始终运行于三个相互叠加的层次。

第一层是制度层：以期刊发表、项目制、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为核心的外部评价制度。它的筛选逻辑是绩效性的——它只承认已经完成“可写出性”转译的产出，不给不适任何计量单位。

第二层是操作层：以标准化方法论训练为载体的研究实践规范。它的筛选逻辑是格式性的——它要求所有研究步骤都必须能够被明确陈述、被复制、被评估。操作层决定了“什么样的认知动作算研究”。

第三层是认知层：被研究者内化的“专业本能”，决定什么值得被注意、什么值得被追问、什么值得为之停留。它的筛选逻辑是自明性的——研究者不再感觉自己“被筛选”，而是觉得自己“自然地”忽略了那些无法被写出的不适。本文的核心判断扎在第三层，因为只有到了认知层，筛选才是不需要外部压力就能自我执行的动作。制度层和操作层为认知层提供了长久环境压力，而认知层是那股压力被内化之后的最终形态。

8.2 跨学科的简要推衍

这道以可写出性为门槛的筛选机制，并不专属于社会学。任何一门共享了相似工序构成的现代学术生产体系——一套标准化方法论训练、一套以发表为核心的科层评价、以及一个与之耦合的制度性理念——都可能面对同质的认知类型性损失。这里给出两个辅助参照，以示意本文诊断的可外推性，但不做过度推广。

经济学中“外部性”概念的硬化轨迹是一例清晰的平行现象。马歇尔与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时，心中带着对市场边界之外那些散逸的、尚未被定价的相互影响的强烈

不适感。他们的分析最初是灵活的、带有探索性的。但随着经济学数理化的推进与期刊论文格式的统一化，“外部性”被逐渐压缩为一个可以放进函数、可以计算、可以写成一篇标准论文结论的变量。一个世纪后，经济学博士生被训练成只要看到市场未覆盖的影响，就用“外部性”来归类并求解，而早期庇古心中那股“市场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就有局限”的不适，早已被教材里的数学推导和习题库所覆盖。被写出的“外部性”是一枚高度可操作化的硬币，而被杀死的是那种对市场边界本身的不信任感——那种不适一旦被写出，就不再是不适了。

文学研究领域同样有自己的版本。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最初是作为对19世纪印象式批评的一次反抗而诞生的。瑞恰兹在剑桥做实验时，曾对学生在诗歌解读中的种种主观臆断感到深切不满，那种不满是一种对既有批评方法的悬置性怀疑。他的“细读”最初是一种要求读者停在自己读不懂的地方、不急于用现成标签去填满的认知纪律。但20世纪后半叶，随着大学文学系学术化程度的加深，“细读”被学术工序硬化为一套标准的论文操作：选取文本、逐词分析、提炼张力、总结意义。一种原本携带强烈否定性不适的方法，被做成了可以批量生产期刊论文的格式。其间被排出的，正是瑞恰兹最早的那种“停在你读不懂的地方、并相信这个读不懂本身在告诉你一些事情”的认知状态。

这两例推衍并不意味着本文可以直接为所有学科代言。它们只说明：当一套学术生产工序将“可写出性”作为知识准入门槛，并且这道门槛已被深深内化为研究者的专业本能时，同一种筛选效应就有可能在不同学科中以不同面目重复出现。本文的结论因而只是在最严谨的意义上适用于以中国社会学为案例所揭示的工序，推衍的效度取决于其他学科是否共享了足够相似的制度层、操作层与认知层构造。

九、结论：认知类型性排除的代价与证伪条件

本文揭示的，不是“中国社会学尚未建成自主知识体系”，而是在当前这道高度标准化的知识生产工序下，最可能催生自主判断的那种认知形态——“不可写出的知识”——在它能够被公共地承认为知识之前，就已经被系统性地排出了公共积累。这道排出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阴谋，而是一套由共同体自觉共建、并已深度内化为“专业本能”的标化工序的自然产物。它以“可写出性”为门槛，把那些无法被无损转译为论文的认知事件筛除在知识定义之外。由此造成的损失，是一种认知类型性排除的长期代价：那些曾经在费孝通们身上发生过的、在Z博士生身上被掐灭的、在应星那里曾被罅隙救下的认知眩晕，它们作为独立形态的知识，不再进入我们这个共同体的自我理解。

本文并不主张退回到前工序的田园牧歌之中——工序本身不是邪恶的，它有它被逼出来的历史合理性：正是这套标化工序，让中国社会科学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初步的学术规范建设，让经验研究免于纯粹的随感。但拒绝审视这道工序的系统性能损失，同样不是学术上的诚实。真正的选择，不在“要工序还是不要工序”，而在面对这道工序已然深达认知入口的筛选力时，能不能有一批人自觉地为那股不适留出哪怕一条窄窄的制度罅隙。

最后，本文给出两个可操作的证伪条件，使整个命题摆脱封闭的自治。第一，若能在当代学术科层评价工序的压力场中（即研究者面临开题、盲审、期刊发表的实际约束），找到批量而非孤例的证据，证明研究者经历了同质的生成性不适，并且这些不适被成功转化为显著改变了既有分析框架的公共文本（而非在出版后的若干年才被逐渐承认），那么本文关于“系统性地排出”的判断就需要被大

幅修正。第二，若能证明非正式交流渠道在不借助任何制度罅隙的条件下，仍然能够有效地把不适所携带的否认性信息无损地输入下一代研究者的认知习惯并实际改变了共同体的研究路径，那么本文关于“工序性筛选已深达认知层”的论断就需要退回到仅适用于正式渠道的弱版本。本文将在面对这两类证据时自愿接受修正。

参考文献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叶启政，《社会学和本土化》，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

叶启政，《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三民书局，2005年。

Polanyi, Michael.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Foucault, Michel.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Gallimard, 1969. (《知识考古学》)

Latour, Bruno.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Latour, Bruno,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注] 脚注编号[1][4][5]对应正文中访谈材料的来源信息，因保护受访者隐私而采用化名处理，具体受访者信息及编码方式存档于作者处备查。

附论零·本组选篇说明（编辑增补）

本文属张琼 2026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投稿的两组共八篇：一组的原初问题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时代命题」，另一组是莱克维茨的「独异性化」诊断。每组四篇（三个金点子+一次新典范涌现）。编辑逐篇通读评分后录取七篇，本文为其一。落选的一篇是《自噬性共生》——作者站上已有《自噬性适应》《改不动的机器》《判准寄生的双向吞噬环》三个同族概念，而该文「系统把自身赖以产生新异的能力代谢为维持运转的养分」这一机制与《判准寄生的双向吞噬环》几乎同构，自噬这条路径在本专栏已经走满，按站内近邻规则退出本组。其余七篇均按下文附论一的方式补切最近邻后发表。

附论一·全球近邻补切（编辑增补）

本节由编辑增补，不属作者原稿。评分时按严格的全球库口径检索最近邻，发现本文有两个未被正文请上桌的对手；它们不削弱本文的判断，但本文的不可还原性主张必须先要在它们面前站住。以下逐条给出：该对手已经走到哪一步、分离线在哪里、以及一个能把两边分开的判决性对照预测。

1. 柯林斯的默会知识与 TEA 激光案例

它已走到哪一步。柯林斯用 TEA 激光的复制史证明：有一类知识无法经由文本传递，只能通过研究者之间的亲身接触转移——这是「不可写」这一主张在科学社会学中最硬的经验支点。本文正文已切波兰尼，但未处理柯林斯这条更近的线。

分离线。分离线在**它能不能被传**。柯林斯处理的是**能传但不能写**：知识经由学徒制、实验室互访实实在在地转移了，只是不经过文本。本文处理的是**连转移都不发生**的那一类——它是一次认知停顿，携带的是「你手上的工具在这里切不进去」这条否定性信息，它不是一种可被掌握的技能，因而没有可供转移的载体。

判决性对照预测。设置密切接触条件（长期共同田野、师徒同行）：柯林斯预测该类知识可被有效转移，接受方能独立复现；本文预测**这类认知停顿仍不转移**——接受方能复述那个场景，却不产生同样的停顿。若密切接触即可转移，本文所命名之物就是柯林斯默会知识的一个子类。

2. 舍恩的行动中的反思（reflection-in-action）

它已走到哪一步。舍恩描述了专业者在实践中遭遇意外时的即时反思：他与情境对话，就地重构问题框架，并由此产出新的行动框架。这是「实践中的意外如何被处理」这一问题最有影响的答案。

分离线。分离线在**它停在哪里**。舍恩的反思产出了**新框架**并可被事后重构与教授；本文的不可写出的知识**停在停顿处**——它的认知价值恰恰在于它尚未被转成任何框架，一旦被转成框架，它所携带的那条否定信息就被新框架吸收掉了。

判决性对照预测。追踪认知停顿事件的去向：舍恩预测多数最终结晶为可陈述的实践知识；本文预测在标准化工序下**多数被直接丢弃**，且丢弃率随工序标准化程度上升。若丢弃率与标准化程度无关，工序筛选这一机制就没有经验落点。

附论二·本次增补所核验的文献（编辑增补）

以下条目为编辑在增补附论一时核验，非作者原稿所引。

Collins, H. M. (1974). The TEA set: Tacit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networks. *Science Studies*, 4(2), 165–185.

Collins, H. M. (2010).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ön, D. A.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New York: Basic Books.